

清代滿族詩詞十論

● 张佳生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序 言

70年代末，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倡讨论和研究满族文学，频开年会，国内学者多应邀参加，未及十年，硕果累累，《满族文学研究》、《满族研究》、《满族文学》诸刊物，相继出现。个人之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此《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即其中之皎皎者，实当年讨论会培养之功也。

以往，满族文学迄未成为独立之学术研究项目，满族诗词更无专论之书，有之实自佳生先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始。佳生先生尊人震泽教授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执教于辽宁大学，学问精深，著述甚多，享誉海内外。佳生得家学渊源，而复积十年功力，成此著作。书成，索序于余。

余谓满族文学最初多以说唱并重为主，《尼山萨满传》即为其代表作。其后，说、唱分途，“说”则缩说唱文学内容而为故事，实为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之滥觞，至今满族故事老人之多，即由于此。“唱”则由萨满巫歌、自度歌而民歌。与汉文化接触后，上则接受汉

人诗歌模式，为诗为词；下则近于汉族之鼓儿词，为子弟书，为八角鼓，为大鼓曲艺，皆能流传至今。

满族知识分子之韵语，何以易选汉族诗词模式而不另创新体？盖满洲兴于长白山下，与女真起于松花江畔者不同，邻近汉地，易接汉人，入关之前已相互影响，入关之后又沿袭明制，相互融合于潜移默化之中，有自来矣。故金元韵语不全袭唐宋诗词，而溶入本民族语言别创元曲。清则即汉人诗词模式，注入新鲜血液，致成诗词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故其诗媛词客之众，亦非金、元两朝所能及也。

清诗、清词之盛，在于立新意，创新境，脱传统之束缚，发自我之心声，满族诗词尤能如此。其文学之作，溶入纯朴满族情感，虽一诗一词，足可见满人之思想性格，即哀感之手笔，亦流露刚健统一气魄，男则不恋于利禄，女则不耽于婉约，非溺于传统世俗文化者所能领会。

书中十论，简约精当，既可览满族诗词之盛况概貌，又可见满族诗词之风格特色。搜罗爬梳，用力甚深；立论阐述，多出新见。若继续潜研，则清代满族文学之大观，将呈现于读者眼前，余为之有厚望焉。

启琮

壬申春日于北京望儿山寓庐

目 录

序 言	启琮
清代满族诗歌概论	1
论清代满族诗歌的特点	132
论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及形成原因	179
八旗诗论五评	194
清代满族词坛述论	215
清代中叶满族词坛兴盛之原因	320
论纳兰性德的诗词理论	333
岳端与《玉池生稿》	368
铁保与《惟清斋全集》	400
袁枚与八旗诗人 ——兼谈满汉诗歌的关系	414
后 记	434

清代满族诗歌概论

有清一代，满族诗歌可谓蔚蔚大观，其作者人数之多，以人口比例而言，较汉族尤为胜也。近 300 年中，名家辈出，帝王中之康熙、乾隆，宗室中之岳端、允禧、文昭、敦诚，文人中之曹寅、尹继善、铁保、斌良，布衣中之长海、瑛宝、兆勋，闺秀中之兰轩、西林太清，皆饮誉于当时。满人自视能为诗，遂有《熙朝雅颂集》之刻，又有《雪桥诗话》代为阐发。然而现代以来，满族诗歌备受冷落，研究中国诗歌之文章鲜有论及者，即数种文学史之巨作，也无人涉及，仅纳兰性德之词，曹雪芹之《红楼梦》偶见书中，亦不是以满族诗文家面目出现，舍满族诗歌而言清代诗歌，失之疏矣。清代满、汉诗歌互为影响，此当时时代之所限，不仅诗歌如此，即词、小说也无不如此。况清代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满族所左右，舍此条件而纯言文学，怕难得出明论。

清代满族诗歌应受到重视，其一是因为它同样为中国文学之瑰宝，其二是因为它为丰富繁荣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它所取得的成就和起到的作用，为汉族诗歌所无法代替。满族诗歌能够反映满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比如满族统一全国后的大一统思想，急于建功立业之思想和取代明朝后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在他们的诗歌中都有流露。满族诗歌还能反映清代满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兴衰与分化。比如清初的诗歌正值满族崛起之

时，多慷慨豪放之音。清中叶战事减少而又生活平稳，故多清丽稳健之作。晚清国势颓败，民族地位动摇，便多悲慨凄凉之声。满族诗歌不仅描绘出满族发展变化的线索，而且满族内部的分化在诗歌中也有表现，以宗室为例，一些人高官厚禄，一些人只承袭虚名，还有一些人则沦落到下层，这种分化在他们诗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满族社会的现实与矛盾。在满族诗歌中，还能看到满族与汉族及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状况。如纳兰性德诗歌中多有与汉人酬唱之作，江南及京师名流多与之交往，他去世后赠哀辞者绝大多数为汉人。曹寅任江宁织造时，与江南汉族诗人交往极广，感情亦深，杜齐《些山集》中有句云：“异姓交情笃，惟君知我心。”而为曹寅“楝亭图”题词者，皆一代名士。另如岳端、鄂尔泰、尹继善、铁保、永理、英和等等也都与汉族文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为满、汉民族关系的缓和与融洽做出了努力。至于满族的诗论，对清代诗坛的贡献更大。如主张自然真实，反对摹仿；主张诗应作为自己经历与思想的真实纪录，而非与人争奇斗艳。正由于满族诗坛不乏英才，汉族诗人才乐于与之交往，像曾领袖诗坛的王士禛、袁枚都广交满族诗友，即连朱彝尊、陈维崧、翁方纲、沈德潜，甚至耿介傲骨的郑板桥，也无不与满族诗人有深情厚谊。满、汉诗歌的相互补充，不但繁荣了清代诗坛，也使两者相得益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满族对于诗歌的爱好，几乎达到了热烈的程度，满族诗人差不多遍布了各个层次。这些人中除儒臣、文人善作诗外，从康熙以来的历朝帝王、宗室王公、统军之将帅，乃至妇女，也多有善于作诗歌之人，这对于接触汉族文学不算长久的民族来说，确是一个奇迹。正是他们真实地记录了民族发展的历史，用诗的语言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为清代诗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为了便于叙述和说明，我们没有按朝代来介绍这些诗人，而是按各自的身份地位将他们分为四类，即宗室诗人；官吏诗人；布衣诗人；妇女诗人。这样做也许更能清楚不同层次不同诗人的情况，从而从整体上更好地了解满族诗坛的进程与特色。

一、宗室诗人

有清一代皇族宗室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其数量之多是以往历代皇族宗室所无法与之比拟的。自满族入关之后起，宗室诗人便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并出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诗人。在清中叶以前，他们是满族诗坛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满族诗歌的发展趋向和水平，受到了像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这样一些诗文大家的重视。礼亲王昭槤即是一位诗人，惜其诗不传，所著《啸亭杂录》“宗室诗人”条中说：“国家厚待天潢，岁费数百万，凡宗室婚丧，皆有营恤，故涵养得宜。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有清一代的宗室诗人情况确是如此。

宗室诗人的地位和经历并不都相同，在思想感情上也存在着差异，其诗歌的风格和情感的表达也就不尽一致，以此可把他们分为三种。

（一）帝王兼诗人。清入关后的历代帝王几乎都能写诗，其中突出的是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正处于“康乾盛世”时期，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文治武功多有成效，他们的雄图大略正在或已经实现，故其诗歌充满了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精神。作为帝王，他们是最高统治者。作为诗人，他们也与其他诗人一样以诗言志抒情。在这里我们把他们作为帝王，但更主要的是作为诗人看待的。

他们的诗有异于常人不同的气概，表现出了满族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如康熙玄烨《赐奉命大将军杰淑二首》：

卷旆生风壮气扬，早持龙节定炎方。秋毫无犯民心悦，尽扫褴褛奏凯章。

旄钺才临父老迎，楼船一举海波清。金瓯已定千年业，铜柱须标万古名。

《南苑阅马》写道：

渥洼龙种雪霜同，毛骨天生气格雄。八骏齐观南苑里，岂夸当日玉花骢。

这类诗歌气魄宏大、气格雄浑，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诗人阔大的胸怀和对统一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表现出作为帝王的那种勤民思想和自信心。康熙帝的诗歌并不都是采用这种题材入诗的，也并不都是这种单一的风格，他还有许多清新明快的“诗人之诗”，表现出他诗歌风格的另一个特点。如《白洋湖》：

遥看白洋水，帆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色满湖中。

在这首略具民歌风味清新畅晓的小诗中，我们只能体验到一种对秀丽风光的美感享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作者，那么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位叱咤风云的帝王之手。

另一首《咏蝉》也会引起我们的同感，诗中写道：

饮露当凉夜，吟风向晚晴。乍移深树影，又听别枝声。与物心无竞，离尘翼最轻。秋怀聊寄咏，爱尔独能清。

这首咏物诗深得咏物之法，如果隐去作者，说它出自一位清介高洁、怀才不遇的文人之手，大约会得到普遍的认同。然而“与物心无竞，离尘翼最轻”却又不是一般文人所具有的那种情感，它反映出这位帝王思想中的另一个侧面。

如果说以上例举的几首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姜女祠》一首就需要认真琢磨了。

朝朝海上望夫还，留得荒祠半仞山。多少征人埋白骨，独将大节说红颜。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几乎与汉人所作无异，同样对孟姜女充满了同情之心。但是如果把它与康熙学习接受汉文化，并利用这来实行统治联系起来看，这首诗就不单纯是吟咏古迹的诗作了。

乾隆帝的诗歌风格与康熙大致相同，在表达的内容上也甚相仿佛，如《赐宴诸外藩》：

豹尾龙旌驻塞陞，穹窿帷幕庆云披。底将外视称瓠脱，即看来宾逮月支。千祀永遵清制度，中朝间用汉威仪。擗官三爵何须限，正是秋高湛露时。

再如《枫》一首：

乍见新林三五枝，停鞭还为立移时。吟丹自我偿诗债，突绿看伊入画姿。松柏有心原共看，李桃无色敢争奇。千秋知己应谁是？只有司勋杜牧之。

从以上两位帝王诗人的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和特点，即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气势不是一般诗人所具备的，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诗歌具有这种独有的特点。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使他们的诗歌既无失意惆怅的苦楚，也鲜有对社会黑暗的暴露。这是他们诗歌中不可强求的一个弱点。

（二）政治上无大作为，生活富贵平稳的宗室诗人。这种诗人以历朝诸皇子为主，如皇太极之子高塞。康熙诸子允祐、允祉、允禩（雍正）、允祺、允弼、允祥、允禄、允礼、允禧、允祁、允祹都以能诗显露。雍正诸子如弘昼、弘瞻；乾隆诸子如永璉、永瑔、永璘、永理等等亦均有诗稿留世。乾隆朝

汉族诗人赵翼在《簪曝杂记》中曾记载说皇子五更时分入书房，“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图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可见清代对皇子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在他们之中出现一些诗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人中也有人小有挫折，但他们的诗歌没有发生特别的变化，仍可属于这一群诗人之中。顺治朝的皇子诗人代表是高塞，他是皇太极第六子，康、乾两朝皇子诗人的代表一位是允禧，一位是永理。允禧为康熙第二十一子，善诗、工书画，被王士禛、陈鹏年咏为三绝之才。著有《花间堂诗钞》和《紫琼岩诗钞》。邓之诚说他“居朱邸而有江湖之思，人情之相反也”（《清诗纪事初编》卷6）。满、汉诗人都认为他是诗坛之健将。不过他的诗多是流连光景、寄答酬唱之作，诗风清秀典雅，有较高的艺术性而缺乏广泛深厚的内容。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中选其8首诗，对他的评价是“王勤政之暇，礼贤下士，画宗元人，诗宗唐人，品近河间、东平，而多能游艺，又间、平所未闻也”。他的诗多写闲情逸致，具有唐人风味，故为人所重视。如《双径》：

客去自掩关，林深鸟声静。徘徊夕阳中，秋烟澹孤影。

沈德潜评为：“秋烟五字，如出贾长江手。”《邦均野寺》写道：

僧罢夕阳钟，客怀正孤绝。山鸟下空林，自啄茅檐雪。

沈氏对此诗评语是：“五言绝，唐人以清淡胜，此又以清瘦见长。”这种评论是切合实际的，并非虚论。允禧在诗艺上为满族诗坛做出了贡献。

永理是乾隆第十一子，有《詒晋斋集》行世，他的诗以怀人诗、论书画诗和山水诗为主，很少涉及世事，就是描写个人

感慨的作品也甚少，自然这与他较为平稳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在山水诗方面，对北地风光的描绘多笔力矫健，《蓟州道上雪作》气势磅礴、淋漓酣畅，与许多诗人的写雪之作在情调和角度上迥然不同，令人不能不佩服诗人领略和表现自然景色的能力。他描写江南秀丽的景色时，笔调清新隽秀，情韵悠然。《扬州杂咏》六首，即以典雅清新之笔描摹出种种奇异景致。他的边塞诗则笔势浩荡，浑穆沉雄，如《秋兴》就刻画出了冷冷大漠的寒荒景象。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野草》和《塞花》两首。前首眼界开阔，气势博大，后首明快流畅，意蕴情浓，虽笔法和风格不同，但都写出了诗人对塞外风光的眷恋之情。尤其像“古长城在木兰中”和“残雪关山眼忽明”这样的情感，大约只能出自满人之口，他们没有汉族诗人出关后的凄凉悲慨之感，其诗也就大都感情充沛，格调高昂。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他对东北故乡的描写之中。这类诗人所选用的诗歌题材和内心情感大致如此。当然，也有一些境遇较好而诗作能表达更为丰富、深刻内容的宗室诗人，奕绘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

奕绘生于嘉庆四年（1799），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清高宗曾孙，袭爵贝勒，官正白旗汉军都统。奕绘的诗歌同一般的达官贵人不同，很少有浮靡之气，他对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对下层社会的贫困都有深刻的认识，这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其诗歌成就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奕绘除了对一般的社会腐败现象给予暴露批判之外，特别对满族中出现的衰败腐朽现象进行抨击。《炮手儿》一诗写炮手的儿子随营充军，有一技之长，而那些纨绔子弟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诗人“眼看华族胄，败弃日纷纷”的感慨是异常沉重的。《牧羊儿》在描写一位牧童“打头中羊头，打背中羊背”的精湛技艺之后，对昔日以骑射见长，而今“五发中三四，升迁换冠带。可应承平赏，难当军阵队”的八旗兵进行了讽

刺，然而这情况是令诗人痛心的。《砖头富》一诗刻画了一个极端吝啬的满族参领富森布的丑恶嘴脸，这个人靠卖拾得的砖头和克扣兵饷致富。虽有“四十万金产”，但家中却“饭无蔬无肉，无床无衾褥”。由于他贪鄙的行为，终于被“案具谪戍边”了。这长达80句的诗歌极尽揭露其鄙吝之能事，从这个典型形象中揭示出满族官吏中出现的腐败趋向。《两富翁》诗中通过对两个都曾极富贵的官宦之家，由于子孙不肖、挥霍无度，终于“奇穷不可言”靠借债卖宅度日的描写，揭示出八旗制度的弊端以及由此而给八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诗人在结尾处写道：“有子不留金，陶诗亦屡云。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我今既多男，后时孙必繁。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熟玩《富翁》篇。”诗人的这种认识是很有深度的，他以宗室显贵的身份而能敏锐地体验到八旗制度的衰败，并能提出“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的看法，是极有眼光的。而与此同时，奕绘却有一些歌颂和同情汉族下层人民的诗篇，最有代表性的是《棒儿李》和《挖煤炭》两篇。这两首诗以纪实的手法描写了下层汉人的扶贫救危的高尚品质和挣扎于水火之中的境况，真切感人。这一切表明奕绘对八旗制度的怀疑和对满族内部腐化的不满，超越了他同时代大多数的满族人的认识，也超越了当时所存在的民族局限，从而使他的诗歌更具有了深度和价值。奕绘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当然不是主要由于他自身经历是否坎坷，而是出于他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感触，以及对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当然也与清至嘉道之际逐渐衰落的发展趋势有关。奕绘对于诗坛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拓了宗室诗人的写作题材，加深了宗室诗人诗作的思想深度。附带说一句，奕绘还是清中叶词坛上的一位名家，有《南谷樵唱》、《写春精舍词》。他的词作也同样坚持了诗歌的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他在诗词两

方面的贡献确定了他在满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 本人被贬斥削爵或因祖上获罪而受到牵连郁郁不得志的宗室诗人，这些人多数是旁系皇族，少数也有皇室直系子弟。

满洲内部自努尔哈赤起争夺权位的斗争就开始了，宗室中有不少人被治死、禁锢、削爵、贬斥，其党羽也都遭到芟刈之祸。如努尔哈赤杀其弟舒尔哈齐并其二子；皇太极杀舒尔哈赤之子阿敏；顺治福临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自尽；雍正胤禛囚死弟兄允禩、允禟；乾隆弘历圈禁弘皙。这里不过略举数例，旁系宗室被杀、被贬之人更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人子孙日繁，戴着罪人之后的帽子，没有几个能得到重用，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以致于有贫困潦倒者，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也就油然而生。在这些诗人中，清中叶以前，以表现内心的忿懑和不平为主。清中叶以后，以暴露社会黑暗来发泄内心的愤慨和抑郁成为他们诗歌的基调。

这类宗室诗人在清初期、中期和晚期都曾出现过有代表性的诗人。在康雍年间出现了主要由岳端、博尔都、塞尔赫、文昭组成的诗人集团。这4人中，前3人是“三从昆弟”，岳端是文昭的叔祖，交往密切，以诗酬唱。对这四位诗人满人非常重视，论诗之际，必要提到。道光间人麟魁在《詒晋斋集序》中说：“（宗室）自红兰贝子（岳端）首倡风雅，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月山上公（恒仁）先后继起，提倡宗风，代有闻人，未易更仆。”其他如昭槤在《嘯亭杂录》，震钧在《天咫偶闻》中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汉族诗人如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查慎行、陈鹏年等对他们也多褒词，可见影响之大。

岳端是安和郡王岳乐子，初封勤郡王，康熙二十八年被降

为贝子，康熙三十七年康熙下谕：“固山贝子袁端（即岳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著黜革。”岳乐为努尔哈赤第七子饶餘亲王阿巴泰第四子，袭爵安和亲王，死后缘事追降郡王，削谥，岳乐一支逐渐失势。雍正元年曾有诏曰：“曩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皇考，蒙恩始终宽宥，而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玛尔琿、华圻相继夭折，爵位久悬，岳乐诸子伍尔占，诸孙色亨图等，怨望形于辞色。廉亲王允禩又复逞其离间，肆为谗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清史稿·诸王传》）从中可看出岳乐及其子孙的失宠不仅仅出于自身“全不知感”、“怨望形于辞色”，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同与雍正争夺帝位的允禩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绝对不能容忍的。雍正在表明这种态度的时候，岳端刚去世五六年，所说的诸子当然也包括他了。由于有这种政治背景，岳端的诗风便与前面说的宗室诗人截然不同，疏狂清隽是其特色，诗中常迸发着激愤之气。如《题画绝句》四首中的《画葡萄》、《画鱼》两首：

曾闻诗胆大如天，请看狂生画亦然。乱点葡萄十数个，只求神似不求圆。

狂夫作画未曾难，一瞬工夫数笔完。单写鱼儿不写水，诗中自信有波澜。

这两首诗名为题画，不难看出他并无闲情逸志赏画，而是借此抒发胸中郁愤之情。岳端还有一些“怨望形于辞色”的作品，如《咏怀》2首写得就不甚隐晦：

回忆少年游，恍恍如隔世。美人不可接，思之形梦寐。我今已壮胜，不得恒称意。恐及称意时，老亦相随至。

人世相纷争，纷争利与名。仆将利让人，树名思自荣。拥书或达旦，得句时夜兴。近好黄老言，颇知生死

情。虚名复何益，日夕常营营。枯骨不借润，徒招人妒生。

岳端的诗句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实有所指。在人事“纷争利与名”的情况下，他让利而求名，既使这样他还是深刻感到即便舍利求名还是会“招人生妒”，于是求名之心也不得不泯灭，只得“近好黄老言”躲避纷争的人世了。他的“美人不可接”，“不得恒称意”的处境和由此产生的感慨，使他对朝廷掌权者产生了愤排之心。这种思想情绪在《竞渡曲》中表露得更为明白：

才人自古多酒徒，独醒只有屈大夫。屈大夫，尔将胡为乎？不从渔父谏，甘受公子诬。我虽知此是寓言，终投湘江何其冤！湘江万丈波涛恶，中有蛟龙与鲸鳄。君不见今人造龙舟，喧腾鼓吹吊中流。群为大夫沉角黍，水族依然争不休。嗟乎！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洒，庶几醉乡还可游！

此诗题为《竞渡曲》已含人世纷争之意。诗人借屈原投江之事来发泄对世事的不满，时时从自身的感触出发，而非真要指责屈原投江之举。他认为即使“不从渔父谏”，也不应“甘受公子诬”，以至成为千载冤案。而且投江之后在恶涛万丈，蛟龙鲸鳄横行的环境中照样不得安宁，徒为人所利用，不由得发出了“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的慨叹，只好沉溺于醉乡之中了。这一切都是岳端思想的真实写照，可看出他对皇族相互攻讦争斗的深刻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态度。全诗的讽刺意味也极浓厚，是为诗人真情实感遏制不住而喷发出来的作品，读此而“以史证诗”，我们就会找出岳端诗歌创作的根源了。

博尔都袭封辅国将军，他与岳端是堂兄弟，其家世也有一段经历。博尔都是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之孙，塔拜以功封镇国将军、贝子，崇德八年“坐附罗什博尔惠谄媚诸王，造言排

衅，削爵，黜宗籍。九年复入宗室，授内大臣，十二年卒”（《清史稿·诸王传》）。博尔都父亲拔都海是塔拜第六子，晋辅国公。博尔都为拔都海第三子，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以罪革退，十九年复原封，三十六年卒，追削封爵。可见也是一个不得意之人，他的家世和同宗兄弟的遭遇对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过他的家世和本人的生前情况都较岳端要好些，因此他的诗歌也不如岳端来得激烈。他的感怀诗是这样写的：

殷红凋谢奈何花？无那悲来反强歌。窗外荷池春雨过，荷珠争似泪珠多。

这首诗题为“感怀”，是写内心之情绪。诗人开篇翻用“无可奈何花落去”句借以点明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次句写悲慨之极而长啸高歌，以舒泄郁闷的心境，然而这不但没有减少愁苦，反而更引动了自己无限的愁绪，泪如雨下了。全诗充满了感伤的情调，虽无激愤之笔，但我们却似乎看到了他的内心如波涛翻滚一般，不能平静，词虽平和，意实激愤。这也是博尔都诗歌的一种风格。汪琬在《问亭诗集序》中评价博尔都时说：“先生之学，贯穿经传，错综典故，又深得性命之旨，博求天人之源。先生之于道也，琬诚愚陋，不足窥测其所至。若其近体之清新，歌行之雄放，此谓载道之言，亦既诵而属和其一二矣。”博尔都的歌行体豪爽雄放，其《宝刀行》一首为：

我有太乙鸣鸿刀，一函秋水青绦韬。流传突厥几千载，至今铦利堪吹毛。静夜擎来光照室，似有啾啾鬼神泣。洪炉淬就锦江波，良土磨用阴山石。当时跌荡少年场，宝装玉珥何辉煌。铜衔横拂秋霜色，金埒斜飞晓月光。岂意我今须发暮，虫网绿窗鸟巢树。抱病不闻车马声，结庐却在蓬蒿处。君不见，干将莫邪本巨观，龙光直射牛斗端。张华既往雷生老，飞去延津风雨寒。

此诗借咏宝刀以抒心志。诗人少年之际意气飞扬，欲携宝

刀建功立业，不想老年抱病，结庐蓬蒿，宝刀纵有吹毛之利，亦无用武之地了。全诗不枝不蔓，一气呵成，确有雄放之风。博尔都之诗以悼亡、隐居游钓、怀人为多，邓之诚评为“清稳可读”。

塞尔赫是努尔哈赤异母弟穆尔哈齐曾孙，授奉国将军，官至兵部侍郎，乾隆十二年卒。《清史稿》无传，李锴有《少司马宗室塞公家传》。塞尔赫一生不好虚荣，仕途比较顺利，然属皇室旁支与努尔哈赤族系相比，既不如其受重视，也没有在生前遭打击。不过塞尔赫为汉军正白旗云贵总督蔡毓荣之婿，蔡因罪被弹劾，拟斩免死发送黑龙江。塞尔赫次女嫁给蔡毓荣孙永福。永福父为兵部尚书蔡珽。蔡珽先曾得罪未做皇帝时的允禩（雍正），后被弹劾，以18罪定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改斩监候，下狱13年，其子永福终身遣戍。乾隆即位时才赦免，然已10年矣。塞尔赫次女也等了永福10年。两世婚姻，不免受到牵连，以此塞尔赫诗中多有讽刺不满之语。如《西洋镜》一首：

西海霜侵汉使头，葡萄数醉月支秋。归来要领都无得，爵赏居然博望侯。

虽名为咏西洋镜，却与题不应。全首讥刺出使西欧之官员只知吃喝玩乐，有辱使命，糊涂去又糊涂来，居然又予升迁。不但揭露了官场的腐败，也抨击了帝王的昏庸，从而显示出诗人的极度不满。另如《鹺关》一首揭露出的社会黑暗现实也很深刻：

众水会津门，东流势浩瀚。湍湍辨东北，飞湍激洄澜。浮梁跨奔流，长虹亘秋汉。万落迤市廛。千櫓集鸛鹄。煮海堆白盐，分飞从泮涣。皑皑玉沙明，峨峨雪山灿。咫尺价悬殊，（原注：关桥之南，斗盐三钱，过桥增价，不啻倍蓰）公私竟昏旦。嗟哉天地利，何年成垸断。